

T 9642

“1950 年代的中国”学术讨论会

建国初期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研究——以 上海为中心

王立诚 管 蕾
(复旦大学历史系)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

联合主办

2004 年 8 月·上海

建国初期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研究——以上海为中心

王立诚 管 蕾

建国初期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影响所及,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办学方向的改变,也关系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大结构转型,因而值得做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根据有关的档案文献和报刊资料,着重从梳理上海一地的情况,来探讨这场院系调整的背景、过程和效应。虽然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在1949年解放初的人口是545万,^①只占全国4亿5千万人口的1.2%,但上海却是中国近代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尤其是一个高等教育事业的重镇。例如有统计表明,1949年,上海有高等学校41所,占全国205所高等学校的23.4%;在校学生20330人,占全国学生总数116504人的17.5%;教职工5003人,占全国教职工总数45983人的10.9%,其中专任教师1889人,占全国专任教师总数16059人的11.8%。而且,解放初上海高校教师中,教授、副教授达1138人,是全国高级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②因此,探讨院系调整在上海的实施情况,对于深入分析这场变革在中国高等教育和知识分子中所产生的实际效应,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 高校院系调整的背景

关于如何评价50年代的院系调整,现有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它是为适应中国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体制转型而进行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另一种看法认为它是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上全面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结果。这些看法虽然从办学方向和教育模式的角度,道出了这场变革的重要特征,但对院系调整之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发生,尚缺乏全面的历史性分析,尤其是关于人们在那个时代的特定社会认知和心态的分析。

这首先涉及到新中国成立后就高等教育设定了怎样的目标。

关于教育观念的权威性表述,是建国时制定的《共同纲领》。其中提出:“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新教育的基本方针是“理论与实际一致”,依此,“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

1950年6月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对这些观念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适用作了具体阐释。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开幕词中,就整顿和加强高等教育的方针所提出的基本观念是:一,“我们的高等教育,必须密切地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的需要,而首先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把“理论与实际一致”理解为高等教育不能“为学术而学术”,必须与生产

^①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91页。

^②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4年》,1986年出版,第433页,第966页,972页。但据陈伯海主编:《上海文化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上册,936页),上海在1948至1949年年5月的高等学校有43所(大学10所,独立学院11所,专科学校22所),学生30911人。但据笔者统计,解放初上海的高校应不下46所,详见本文第二节。

实际相结合；二，高校“为工农开门”，以便培养工农成份的知识分子；三，“应该随着国家建设的逐步走上轨道，逐步走向计划化”。这包括“实现统一和集中的领导”、调整高校院系和改造高校师资与教材。^①因此，高校院系调整的提出，是基于以一种集中统一领导的高校体系来为国家建设提供技术人力资源的设想。

苏联模式的示范效应是很清楚的。早在建国之初，人民政府就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建立中，开始了全盘引进苏联高校模式的试点。在这次高教会上，教育部总顾问阿尔辛杰夫便就苏联的经验指出：“苏联的工业化是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比较资本主义社会更迅速更有力。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是有计划的，所以为满足这种更快的工业化的要求，高等学校立即进行了改革，很快地建立起许多独立学院。”“苏联高等教育的改变，是将大学从培养抽象的广泛的人才改变为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的机构。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发展原则上亦应如此。”^②显然，将高校改革与实现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化相联系，突出专门人才的培养，体现了苏联模式的特征，这些特征也贯穿在中国高校的院系调整中。

但是，这次高教会最后仅要求高校进行课程改革，并未就高校本身的调整提出进一步意见。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该会的结论中反映了当时的考虑：旧高校的改革“必须是谨慎小心，不能用急躁的方法来进行。这是因为：第一，教育的改造是属于思想领域内的事。旧思想旧观点的变化和被消灭，比经济基础和其他上层建筑（如政治、法律）的改变，一般地要慢得多，它的被消灭必须经过长期的复杂的和系统的斗争；同时新思想新观点也是适应着新经济新政治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超过历史条件的改变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教育内容的改造，即思想的改造，我们决不能性急。第二，改革教育，并非全部否定旧教育。‘新的人民文化是人类一切知识积累的自然发展之结果’（列宁），我们必须非常郑重地和关心地吸收旧高等教育的一切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合理的成份，和坚决抛弃它的反对人民利益的内容和填鸭式的教学法。第三，改革旧教育是需要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一件大事。这种改革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过程。只有稳步前进，才能达到团结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目的。过于性急，将使一些人感觉受不了，达不到团结他们的目的。第四，改革旧教育的主观条件（如人力、教材等）是逐渐形成的，也是必须努力创造的；急于改革而忽视创设条件，不但无效，且有把事情弄坏的危险。”^③虽然这番话并非针对院系调整而言，但由此可见教育部当时对高校改革的态度是慎重的。它意识到教育改革所涉及的思想转变一般比经济和政治改革滞后的规律，也注意到对旧教育需要批判地继承，尤其是强调了团结知识分子的重要性。

教育部顾虑知识分子的反应是有道理的。上海作为集中了全国五分之一高校的地区，是这次会议中反映全国高校地理分布是极不均衡现象的典型，本应是高校调整的重点，但高校是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所，这种调整势必引起上海知识分子的恐慌。例如有位教授后来承认：上海解放之初，他就听说院系调整，但以为这是公立学校的事，私立学校可以不调整，因此他辞去同济大学的教职，改受大同大学之聘，“当时我顾虑到我的家庭包袱，怕因调整而离开上海”。并且，对于同济各院系的调出，他成为公开反对者之一，“其时我不过在同济

^① 《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1950年6月1日）》，何东昌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汇编》（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6页。

^② 《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同志在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教育部档案，1950年长期卷，卷4。转引自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4-85页。

^③ 钱俊瑞：《团结一致，为贯彻新高等教育的方针，培养国家高级建设人才而奋斗——6月9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结论》，《新华月报》，第3卷第2期。

兼任三小时课，但同济是我母校，似乎‘爱校’岂甘后人”。他“认为一开始就把文、法两院并入复旦，继而把医学院迁汉，早迟必并入武汉大学，最后又叫理工两院迁大连。这显然是使同济四分五裂，终于走向消灭的一途。是可忍孰不可忍”。^①从中可见，上海知识分子对于院系调整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这里面既有生活方面的考虑，也有爱护母校的情结。同济的理、工两学院最后没有迁出上海，与这种反对不无关系。

然而，解放后人们对国家将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预期，却在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出台之前，便提供了一种社会氛围，促使高校向重点发展工科院校方向转变，以此作为对高等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解读。大学入学考生志愿是最敏感的社会风向标。1950年暑期招生反映，考生的第一志愿中，甲组（工、管、理）共53453人，占总人数的44.7%；乙组（文、法、财经、教育）共26603人，占总人数的22.25%；丙组（医、农）共28561人，占总人数的23.88%。^②一种“重理轻文”的倾向已经悄然形成。

事实上，这种强调专门训练而又进而强调工科，并不全然是学习苏联的结果。例如，黄炎培是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倡导者，建国后任负责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他谈到当时的情况是：“平时到处闹失业，但某一大工作举办时，将又苦于人才不够用了”。他认为，“问题是在品质上边，所需要的是受过各种专科训练的人员，而呼号求职者，大都属于仅受普通教育者”。为此，他提出，“一，制定全国连续若干年经济总计划，中间包括农业、重轻工业、矿山、森林、渔牧、水利、垦殖、铁道、公路、航运、海运、一切生产运输、是要全力来执行的。二，在制定前项计划时，提出前项计划所需要人才的种类，数量和开始需要期限，制定连续若干年的全国教育总计划。三，根据前项教育总计划，一面长期短期分别教育训练，一面调查前项经济总计划所需要的全国现有各种人才，登记备用。”他声称：“这些，为了发展生产，该这样办；为了帮助解决个人生计问题，根据物质生活决定一切的大原则，不也应该这样办么？”^③从这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全面计划性经济与相应的全面计划性教育的蓝图，早在新中国宣布成立前便已跃然纸上，而这一设想的思想 and 经验背景是早年美国式的“职业教育”，虽然此时已打上学习苏联的标记。

解放初高校的公私并存，在所有权上构成了政府统一调整高校的一大障碍。这在上海尤其突出，因为私立高校占了上海高校的绝大多数。这些私立高校中，一部分是外国传教士办的教会大学，如震旦、圣约翰、沪江大学等，都是历史悠久的名校，校舍、师资和设备均属上乘，但校产的所有权属外国教会；其余中国私人设立的高校，虽然大多是师资和设备条件很差的“学店”，但如光华、大夏、大同大学等也都有悠久的历史 and 较大规模，是上海知识分子的重要巢穴，要使这些私立高校愿意服从国家的统一调整并非易事。例如大同大学的一位教授后来说：“大同大学，作为大学来说，条件是很差的，但是，我个人因贪图着它的待遇不坏，地点便利，颇希望最好是迟几年才调整。”^④

在这个问题上，1950年的经济萧条无疑在客观上推动了一些私立高校的转变。由于遭受自然灾害和国民党对上海的“二六”轰炸，上海的市面萧条，私立学校都发生了经济困难，学校生源减少，学生付不出学费，这使得“过去受资本主义社会渲染的商业性质的所谓学店

^① 大同大学土木系教授吴之翰：《我认识了院系调整的必要》，《文汇报》，1952年8月5日。

^② 中央教育部：《高等学校1950年暑期招生总结》，《华东教育通讯》，第3期，1951年6月25日出版，第24页。

^③ 黄炎培：《教育对建国的贡献》，《光明日报》，1949年9月16日。

^④ 大同大学工管系教授郭大雄：《决心走上祖国最需要的工作岗位》，《大公报》，1952年8月23日。

的办法，行不通了，靠所谓社会‘闻人’，也办不通了。”^①一些学校不得不通过“精简”课程和人员来度过难关，学校作为教职员的安身立命之所已显得不可靠了。如大夏大学，教师和职工作了大幅度的裁减，“不少师生员工都发生动摇，而感到悲观失望，觉得学校办不下去，似乎大夏不幸的命运就要降临，阵阵阴霾弥漫着，工作情绪非常不稳定，有些教授先生已经到外面去找课教，准备大夏‘垮台’的后步。”^②他们对院系调整的态度也逐渐改变。例如大同大学物理系主任姚启钧后来说：“关于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我起初是有顾虑的。我有严重的眼病，身体也不好，且家有老母，不愿离开上海。如果一个人调到很陌生的学校去，那更是不愿意。但，另一方面，我在私立大学教书，经费来源，主要是靠学费的收入，愈下去愈渺茫，政府把私立大学原封不动的改为公立的希望，也很少可能，所以我倒又希望院系调整。”^③而政府方面，根据周恩来总理“办教育要实行公私兼顾”的指示，教育部对私立学校采取了“积极维持，逐步改造，重点补助”的方针，一方面提供一定的财政补助，一方面促使其改革，要求“私立学校应根据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积极和主动地，并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学校的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④这无疑为私立高校服从国家统一调整打下了基础。

最重要的转变是随着抗美援朝运动而来的。教会大学此时被定性为“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麻醉、和灌输奴化思想，以图从精神上来奴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工具。针对美国代表奥斯汀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反华谬论和美国政府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财产，人民政府决定，要求所有教会大学割断与外国的经济联系，并且政府“应分别情况或由政府予以接办改为国家事业，或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民完全自办之事业，其改为中国人民完全自办而在经费上确有困难者，得由政府予以适当的补助”。^⑤

于是，上海的教会大学都转变为政府津贴下中国人自办的学校。同时，在这些学校都掀起了彻底肃清美国影响的控诉运动。无论是校长、教授，还是学生，都纷纷起来揭露美帝的文化侵略阴谋，同时批判自己因此产生的“崇美”、“恐美”的买办思想。在这种氛围下，当1952年全面院系调整时，把这些学校全部消灭，便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正如震旦大学校长胡文耀、圣约翰大学主任委员潘世兹、沪江大学主任委员余日宣当时一致表示：“院系调整将使前教会大学获得新生。在一年多前，这些学校虽已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但因帝国主义一贯施行奴化教育，在师资设备上，还不能很好地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才，而且帝国主义思想影响还没有彻底肃清。经过三反和思想改造，再通过这次全面的、彻底的调整以后，使圣约翰、沪江等被污辱的校名取消，从此洗去历史上的污点，才能真正成为人民教育事业的一部分。”^⑥

真正催生1952年的全面院系调整并使之成为一场群众运动的，是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时，毛泽东发起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他看来，“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① 戴白韬：《在克服困难中改造学校》，《新教育》，1950年，第1卷第3期。

^② 吴泽：《大夏大学怎样克服困难的？》，《新教育》，1950年，第1卷第3期。

^③ 姚启钧：《无条件服从统一调配》，《大公报》（上海版），1952年8月23日。

^④ 钱俊瑞：《团结一致，为贯彻新高等教育的方针，培养国家高级建设人才而奋斗——6月9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结论》，《新华月报》，第3卷第2期。

^⑤ 郭沫若：《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新华月报》，1951年，第3卷第3期。

^⑥ 《华东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会议胜利结束，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即将开始》，《解放日报》，1952年8月6日。

①这样，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便不是作为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成了其前提。而且，“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②，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成了最主要的批判对象。

对《共同纲领》的诠释于是发生了重大转变。正如华岗撰文写道：“在目前中国的教育阵地上，要真正实现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做到学校向工农群众开门，使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不但必须坚决地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而且应该清算教育工作者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包括盲目崇拜欧美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把资产阶级学校那一套旧型正规当作神圣不可侵犯”；表面上标榜“为学术而学术”和“纯技术主义”，而在实际上对人民散播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观点，藉以毒害人民和维持资产阶级的剥削地位，以及“得过且过和反对根本改革的改良主义”。^③

这样，改变原有高校“在地区分布上很不合理；师资设备分散，使用极不经济；系科庞杂，教学不切实际，培养人材不够专精；学生数量更远不能适应国家当前工业建设的迫切需要”^④，便成为“三反”中“反浪费”的政治任务。知识分子中对于院系调整的种种“错误认识”，“如只向后看不向前看的保守思想、狭隘自私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以及‘只愿调进，不愿调出’、‘只可扩大，不愿收烂摊子’、‘有进有出，不进也不出’的本位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等”，^⑤都成为思想改造中批判斗争的对象。

于是，与国家工业化建设直接相关的工科院系调整成为高校全面调整的第一步。1951年1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制定了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在思想教育下，各校代表“从为着本院本系的生死斗争来赴会，转变为改革整个祖国工业教育的重要关键而参加会议”。对于解决各种问题的看法是“从一个小单位的利益，转变为向全国工业建设着眼”。^⑥在这个工学院调整方案的基础上，中央教育部在1952年5月制定了全国高校的调整方案，一场全面的院系调整拉开了序幕。作为思想改造运动的延伸，它除了承担适应全国工业化建设需要的任务外，还有改造知识分子生存结构的政治任务。

二 上海高校院系调整的过程

建国初年，上海的高校直接归当时的大行政区华东军政委员会领导，由其下的教育部在中央政府教育部指导下负责管理，包括课程改革和院系调整等一切改革事宜，也都由华东区教育部直接负责。上海高校院系调整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49年上海解放至1950年末为局部调整，1950年末至1951年末为重点调整，1951年末至1952年为全面调整。

在第一阶段，院系调整只是小规模地进行，同时在课程改革中进行了系科的结构改造。

解放初，上海共有高等学校46所。其中：综合性大学10所：国立为交通、同济、复旦和暨南大学，私立为大同、大夏、光华、沪江、震旦和圣约翰大学。独立学院13所：国立为上海医学院、上海商学院和国防医学院，私立为上海法政学院、上海法学院、诚明文学院、

① 《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50页。

②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1952年6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5页。

③ 华岗：《清算教育工作者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新华月报》，1952年3月号。

④ 马叙伦：《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新华月报》，1952年5月号。

⑤ 《人民日报》社论：《积极实现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新华月报》，1952年5月号。

⑥ 张宗麟：《改革高等工业教育的开端》，《新华月报》，1952年3月号。

新中国法商学院、新中国学院、中国纺织工学院、同德医学院、东南医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专科学校 23 所：公立为吴淞水产专科学校、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上海市立戏剧专科学校、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上海市立体育专科学校、上海市立工业专科学校、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私立为中法大学药学专科学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诚孚纺织专科学校、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上海牙医专科学校、上海商业专科学校、光夏商业专科学校、东亚体育专科学校、上海纺织专科学校、文绮染织专科学校。以外还有上海税务专科学校和南京工业专科学校（沪校）。

在这些高校中，10 所综合性大学是领头羊，据一项统计，这 10 所大学的学生人数占全上海高校学生数的三分之二以上。^①

对于这些高校，人民政权最初采取了“维持现状，逐步改造”的方针^②，首先是完成对所有国立和公立学校的接管，同时要求所有学校进行政治课程改革，取缔国民党政府的“公民”、“党义”等反动课程，代之以马列主义理论课程。^③

初步的院系调整也开始进行。除了将原国防医学院改为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外，首先是停办了暨南大学。1949 年 8 月 23 日，华东军政委员会高教处下达通知，将暨南大学理学院并入交大理学院，文学院并入复旦大学^④。其次在 9 月，取消了同济大学的文、法学院，将其各系并入复旦大学。^⑤同时，把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上海市立体育专科学校、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迁出上海，并入南京大学师范科。1949 年底，私立东南医学院响应政府号召，主动迁至安徽怀远。1950 年 2 月，政务院决定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往武汉，^⑥中法大学药学专科学校则随北京中法大学转为公立后于 1950 年的结束而并入上海医学院。

从这些调整可见，除了停办暨南大学是由于“上海解放后华侨学生锐减，学校陷入停顿状态”^⑦，调整已经显示出加强高校的专门化和削减上海高校规模的倾向，但调整主要涉及公立学校。

1950 年 5 月 3 日，华东区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召开华东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明确了“目前华东教育是维持不是发展的方针”。^⑧调整因而仍只是局部地进行。1950 年 6 月，在华东纺织管理局主持下，同属上海市棉纺织业同业工会的中国纺织工学院、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文绮染织专科学校和诚孚纺织专科学校合并，成立了私立上海纺织工学院。1950 年 10 月，交大航业管理系与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公立上海航务学院；国立上海商学院与上海法学院财经科合并，成立公立上海财经学院。这些调整反映了将同一专业下原先分散的院校整合起来，建立新的专门学院的趋势，但还只是局部的尝试，并且基本上没有改变学校的所有制。

此时，高校改革的重头是课程改革，这也同时牵涉到系科的重组。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整个知识和理论都须全面更新，因而文科首当其冲，课程改革

^① 陈伯涛主编：《上海文化通史》，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36 页。

^② 《钱俊瑞副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点》，何东昌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汇编》（1949～1975），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 页

^③ 《接管上海亲历记》，《上海文史资料第 87 期》，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1997 年版，第 364 页

^④ 刘露茜、陈贻芳主编：《交通大学校史 1949～1959》，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9 页

^⑤ 《同济大学志 1907～2000》，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 页

^⑥ 同济大学医学院最终由中央教育部于 1951 年 9 月决定迁往汉口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改称中南同济医学院。《同济大学志 1907～2000》，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 页。

^⑦ 暨南大学校史编写组：《暨南校史（1906～1986）》，暨南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11 页

^⑧ 《华东高等教育工作会议经过报告》，《华东政报》1950 年第 1 卷第 3 期

“先文法学院，后理工学院”，^①文科不少学科的前景也不明朗。华东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便“反映了大家对文法学院的办理最苦闷，各校都有很多无课可排的教员急待处理，而文法学院下学期如何招生亦很成问题，本届毕业生的出路，在全国整编的情形下也都惶惶不安”^②。虽然新的教材在努力编写，但在强调经济建设的氛围下，文科的萎缩却是大势所趋。尤其在私立高校，精简文科课程和归并相关系科成为摆脱经济困境的手段。例如大夏大学，为了“量入为出”，提出课程改革的原则为“合并性质相同，内容重复的课程，停开不切实际的课程，归并主观条件不够、人数太少的学系”，结果将中文、历史社会、政治、教育心理四系暂时归并，外文系暂时停办。^③

就理工科而言，课程改革也意味着系科在“理论联系实际”下的结构变革。上海理工科的特点是，与上海工商业依赖外资的半殖民地性质一致，大量使用德日或英美的原版教材，“因为这种工商业需要买办性的技术人员，它所需要的工程师，必须要熟读外国的机器牌号、性能和生产工具或工业材料的价目。”^④解放后，理工科教育“和上海的工业一样，从面向国外转为面向国内”，使用西方原版教材便被作为买办性教育受到批判，课程改革便强调了中文教材的编写和使用。这推动了各种教学小组和教研组的成立，以便共同审核教材大纲，从而改变了各系的教学结构。^⑤同时，强调中文教材降低了原先对学生外语水平的要求，外语教学的规模也就大为缩小。在同济大学，原先因使用德语，新生必须先“在新生院”修习一年德语，此时“新生院”便被取消，“德文改于大学一、二年级修读”，学制相应地缩短了一年。^⑥

上海院系调整的第二阶段为1950年末至1951年末，其特征为私立高校的大规模改组整顿，文科被大量压缩，和在工科和师范领域苏联模式开始取代原来的英美模式。

抗美援朝运动爆发后，人民政府要求所有教会大学割断与外国的经济联系，改为中国自办大学的决定，导致了上海私立教会大学性质的重大变化。上海是全国教会大学最为集中的地区，共有震旦、圣约翰、沪江大学和东吴大学法学院、震旦女子文理学院5所教会大学，其中震旦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隶属于法国天主教会，其余都隶属于美国的各派新教教会。这些学校被改成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学校，但由于它们不是“学店”，都是在校舍设备和教职工上开支较大的高质量名校，不可能仅靠学费维持，因而必须仰赖政府津贴。例如，沪江大学自1951年起接受政府津贴，春季学期教育部补助仅占其总收入的8%，到秋季学期则增至30.5%。^⑦因此，这些学校实际上已经成为准公立学校。

此时，私立高校的处境已更困难。在解放前，私立高校的收入来源主要为：学生学费、田租收入以及私人或企业的捐助款三项。解放后，田租收入随土改而消失，整顿工商业使企业或者个人的捐款也不再捐给学校，私立高校的经费来源便只剩下学生所缴学费。1950年后，政府向私立高校提供一些补助，主要是人民助学金和一部分图书经费，但数量很少并有一定的条件，如“确实贫困学生过多”等^⑧。因此，私立高校必须主要以收取高于公立学校

^① 唐守愚：《上海大专院校改进教学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新教育》1950年第1卷第3期

^② 《华东高等教育工作会议经过报告》，《华东政报》1950年第1卷第3期

^③ 吴泽：《大夏大学怎样克服困难的？》，《新教育》1950年第1卷第3期

^④ 钱伟长：《大学工学院的课程改革》，《新华月报》，第1卷第4期，1950年。

^⑤ 陈大燮：《国立交通大学课程改革经验介绍》，《新教育》1950年第2卷第3期

^⑥ 李国豪：《国立同济大学工学院学制及课程改革经过》，《新教育》1950年第2卷第3期

^⑦ 《沪江大学1950年第2期业务总结》，《沪江大学1951年秋季学期决算报告书》，上海档案馆：Q242—31、61卷。

^⑧ 《华东区补助私立高等学校扩大减免费名额暂行办法》，《华东政报》1951年第5期

的学费来维持,但在50年代初全国高校生源总体不足的情况下,这种较高的收费标准又使它们很难招足学生,经济便愈加困难,尤其是随着政权和经济体制变更显得不很吃香的文、法、商类学校和系科,而这些门类的学校和系科在上海私立高校中又占很大比重。

于是,上海私立高校在1951年初开始整顿。一些本来条件就较差的私立高校被兼并或者降级。这包括:上海法政学院、诚明文学院、新中国法商学院、新中国学院、上海法学院法律系、光夏商业专科学校等6校合并成立私立上海学院;上海商业专科学校改为私立上海商业专科夜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改为中等技术学校。^①同时,在较好的私立高校中,一批系科在1951年夏被停止招生。这包括:大同大学的文学系和教育系;大夏大学的社会教育系、教育系和师范科;光华大学的外语系和教育系;圣约翰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教育系和新闻系;沪江大学的教育系、社会系和音乐系;震旦大学的法律系和中文系;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社会系、中文系,教育系和家政系。^②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并入震旦大学,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并入复旦大学。经过这些调整,上海私立高校不但数量大为减少,而且文科系科也大为压缩。

与此同时,在工科和师范两个领域,较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开始进行,并且打破了公私立学校的界限。

工科方面调整是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集中体现。1951年4月,华东区召开了华东区高等学校工学院院系调整会议。会后关于上海的院系调整为:(1)交通大学理、工、管理学院中,管理学院被取消,其各系并入北方交通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工学院的工业管理和工程系并入机械系,轮机工程系并入造船系。(2)光华、大夏大学的土木工程系、科并入同济大学,财经、政治、法律等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3)复旦大学理学院的土木工程系并入同济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4)交通大学纺织工程系和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业专科学校纺织科合并成立公立的华东纺织工学院,由华东区纺织管理局领导。(5)南京工业专科学校改为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由华东区交通部领导。^③这些调整显示了通过特定工程系科向某些学校的集中,以及发展单科性工学院,来强化工科高等教育的意图。

在师范方面,1951年10月华东区教育部决定,以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为基础,成立公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并将复旦大学教育系、同济大学动物学和植物系、沪江大学音乐系和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并入该校。

成立华东师范大学的理由是缺乏“为了培养中学师资的高等院校”^④,然而实际上,当时上海虽然没有师范大学,但在综合性大学里几乎普遍设有教育系,因此问题不在于没有培养教师的学校,而在于培养教师方式的改变。综合性大学的教师培养为英美式的,由教育系与其它各院系合作进行,让志愿当教师的学生在一定的规范下选修相关课程;而新成立的师范大学则为苏式的,要求学生在入学时就确定的某中学科目下接受整齐划一的训练,将来便成为该科目的中学教师。而且,这种培训是全公费的,学生自入学起就具有准教师的身份。

然而与国家要求相比,上海的这些改革还不够彻底。根据1951年8月政务院“学制改革规定”所提出的“高等学校应在全面的普通的文化教育的基础上给学生以高级专门教育,

^① 《华东高等学校院系已适当调整》,《华东新闻类编》,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编,1951年第11期

^② 《华东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总结》,教育部档案,1951年长期卷,卷17。转引自胡建华:前书,第96页。

^③ 《华东高等学校院系已适当调整》,《华东新闻类编》,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编,1951年第11期

^④ 孟宪承:《一年来的华东教育工作》,《华东政报》1951年第20期

为国家培养具有高级专门知识的高级人才。”^①1951年11月的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提出了应该独立设立工学院，认为“若与文法等院合着设立，不便之处甚多。目前全国工学院与文法学院合着设的不少。这样不但影响了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若以目前工学院的任務来说，影响更大。”^②于是，华东区教育部在总结1951年院系调整的问题时认为，现有“旧型综合性大学”过多，“这些学校由于院系庞杂，缺乏重点，既不利于领导，也难以适应为国家培养大批高级专门人才的要求，因此必须对这些学校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和划分”。并且，“现有的工学院也还是包罗各种工程系科的综合性。而为了密切配合国家建设的要求，今后则需要增设各种各样的、更单一化的专门学院”^③。

同时，私立学校的问题在改革中也进一步突出。例如，大同大学提出：“在11月3日中央教育部召开之工学院会议中决定具体方案，私校对于此点最感困难，厥为经费。本人曾还议对于经费一项，除中央教育部尽量补助外，希望各业务部门合作，并给予补助，使私校能发挥为新中国造就建设人才之应有作用。”^④私立高校不可能靠自身条件跟上改革步伐，因而其存废与否也便提上了日程。

1951年末至1952年末为上海高校院系调整的第三阶段。我们通常认为的解放初期院系调整就是指这一阶段的调整，其特征是在思想改造的声威下，进行高校的全面重组，消灭了英美式的综合性大学和所有的私立高校，建立起政府集权管理下的苏式高校体系。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思想改造运动随即在高校中展开。在1952年3月到5月，上海各大高校都停课开展运动。被纳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的上海高校校长、院长和教授们于是尝到了群众运动的威力，纷纷进行触及灵魂的自我批判。例如，圣约翰大学主委潘世兹本属进步教授，此时批判自己是“宗派主义，感情用事，搞小圈子”，“名利地位思想严重”以及官僚主义等。^⑤上海医学院教务长徐丰彦批判自己从个人兴趣出发，进行“脱离实际的研究”，用英文发表许多论文；在同学、同事面前保持“清高”、“尊严”的面孔，“实质上是出于为个人名利打算，是个人主义的假面具”。^⑥交通大学水利系主任徐芝纶则写道：“20年来，我的行动始终被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指导着，为了追求舒服和安闲的生活，我以人民血汗培养出来的知识作为向上爬的资本，以神圣的教学工作作为向上爬的阶梯”。^⑦上海工专教授黄蕴元甚至把他在解放初从美国回来和参加香港两航人员起义，也说成自己想向上爬，“赶浪头，在共产党新中国里抢个地位”。^⑧

显然，这些几乎达到“自污”程度的批判，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的个人尊严和社会声望，极大地加强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心理威慑力。在这种情况下，院系调整便成为对知识分子改造成果的体现。例如，震旦大学理工学院院长金通尹表示：“三个月来的思想改造学习，到此正好做一个考验。我们的主要错误思想几乎无例外地是个人主义。……我们在学习中暴

^① 《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规定》，何东昌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汇编》（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106页

^② 张宗麟：《改革高等工业教育的开端》，《新华月报》1952年3月号

^③ 《华东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总结》，教育部档案，1951年长期卷，卷17。转引自胡建华：前书，第98-99页。

^④ 上海档案馆：Q241-1-18 本校为报送校务活动记录、校务会议记录与上海高教处、华东教育部来往文书

^⑤ 潘世兹：《我的初步思想批判》，《大公报》，1952年8月28日。

^⑥ 徐丰彦：《检查“清高”、保守思想给我工作中的危害》，《大公报》（上海版）1952年8月19日。

^⑦ 徐芝纶：《批判我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解放日报》，1952年7月14日。

^⑧ 黄蕴元：《批判我自私自利向上爬的错误思想》，

露了过去，批判了过去，这次可不能再犯了！”^①曾反对调整的人也纷纷转变思想。例如，同济大学数学系主任程其襄表示，“通过了学习……批判了我过去在同济迁校问题上，不服从国家需要，计较个人得失的错误思想，而今天我已立志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我坚决表示服从组织调配，我绝不再允许渺小的个人主义思想再来影响我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我把院系调整的任务，看成我思想改造以后的一个具体考验。”^②

被解散的大学的校长们也纷纷表示服从国家安排。大同大学校长平海澜虽是该校的创办人之一，此时声称：“过去的大同大学是一片学店，当时负责人办学的目的，是名利兼收”。他经过思想改造后，“坚决保证，抛弃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服从政府统一调配”，“就是大同名义取消，归并他校，我决无丝毫留恋”。^③原教会大学的校长们更是宣布完全服从组织调配。震旦的胡文耀说：“我不管老之将至，愿意无条件的服从分配，人民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人民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沪江的余日宣表示，“我们为帝国主义服务年代最久，今天人民不咎既往，同样地看待我们，我们要全心全意地把自己所有的余力来为人民服务。”^④

于是，这次全面调整的过程极为迅速：1952年5月，中央教育部在全国工学院会议的调整计划基础上制定了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方案，其方针为：“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⑤。该方案于7月底下达上海各高校。8月2日，华东地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成立，舒同任委员长，冯定、孟宪承任副委员长。8月上旬，该委员会制定了华东区院系调整的最终方案，各校迅即按此方案行动。到9月24日，中央教育部便宣布全国院系调整完成。在10月中旬到11月初，上海各高校均已开课。

中央教育部方案中，上海共设高校15所：复旦、交通、同济和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水产学院、上海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华东体育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和华东艺术专科学校。^⑥华东区院系调整委员会的最终方案改为17所，其中，冠名大学的4所：复旦大学（文理综合）、交通大学（重工业工科）、同济大学（土木建筑工科）和华东师范大学；专门学院11所：上海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水产学院、上海航务学院、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华东体育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专科学校2所：上海俄文专修学校和华东交通专科学校。^⑦原设上海的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改设江苏无锡。

在这次调整中新设的高校有5所：上海第二医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华东体育学院、上海俄文专修学校；更名的高校有3所：上海水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被解散的高校为：公立1所：上海工业专科学校；私立12所：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大同大学、东吴法学院、上海学院、同德医学院、中华

^① 金通尹：《拥护院系调整方案做好院系调整工作》，《大公报》（上海版）1952年8月12日。

^② 程其襄：《从积极意义上看院系调整》，《大公报》（上海版）1952年8月23日。

^③ 平海澜：《大同大学的院系非彻底调整不可》，《文汇报》，1952年8月5日。

^④ 《华东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会议胜利结束，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即将开始》，《解放日报》，1952年8月6日。

^⑤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基本完成》，《新华月报》1952年10月号

^⑥ 《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何东昌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汇编》（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152页

^⑦ 《华东地区院系调整设置方案》，上海档案馆档案，A26—2—152卷

工商专科学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上海商业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牙医专科学校（1952年2月并入震旦大学，后随震旦并入上海医学院）。1952年10月9日，上海市成立了停办高等学校联合办事处，用来办理停办学校的结束工作，包括教务事宜和校产教育器材及一般物资的接管调配等。^①

至此，上海的私立高校全部结束。“华东区所有的高等学校，都将由国家办理。从此，高等学校的学生们和家长们，将永远不再为每学期的学费发愁，人民政府将普遍地、同等地供给每一个学生相当于一个人伙食费的人民助学金，并且另外对于有特殊困难的学生，还可再给予一定的补助。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的新措施。”^②

三 上海高校院系调整的效应

上海解放初高校数目众多，曾被目为旧中国高等教育地理分布不均衡的典型。^③经过1952年的调整，上海的高校从解放初的46所减少至17所，从数字上满足了减少上海高校数量的要求。

但是，从表一可见，上海1952年的院系调整主要是上海各校间的调整。上海虽然停办了13所高校，但其人员绝大多数转入上海的现存高校。在现存高校中，调入的外地系科远比调往外地的系科多。从1949至1952年，上海调往外地的重要院校为同济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农学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及交大、同济的部分系科，但也调入了南京、浙江、金陵、东吴、之江、安徽大学等名校的一批系科。

表一：1952年上海各校系科调入、调出表

校名	调入本地系科	调入外地系科	调出外地系科
复旦大学	震旦大学中文、外文、经济系；圣约翰大学外文、新闻系；沪江大学中文、外文、社会、物理、化学、生物系；同济大学数学、物理、化学系；交通大学化学系；大同大学数学、物理、化学系；上海学院中文、经济系。	南京大学经济系；金陵大学经济系；浙江大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人类学系；安徽大学数学、物理、经济系	农学院农艺、园艺、农业化学系调至东北，成立沈阳农学院，茶叶科调整至安徽大学农学院；外国语文系德文组调至南京大学。
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机械、电机、造船系；大同大学机械、电机系；震旦大学电机系；沪江大学物理系电讯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机械	武汉交通学院造船系、造船科。	航空系调至南京华东航空工程学院；水利系调至南京华东水利学院。

^① 《上海市一九五二年停办高等学校联合办事处历史事实的证书》，Q251-1-1 卷

^② 徐葆璜：《华东高等教育史上的新纪元》，《解放日报》，1952年8月3日。

^③ 《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1950年6月1日）》，何东昌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汇编》（1949~1975），第25页。

	科; 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动力、电力、造船科;		
同济大学	交通、圣约翰、大同、震旦大学土木系; 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土木、结构科; 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土木科; 圣约翰大学建筑系。	南京大学、之江大学建筑系。	土木系水利组调至华东水利学院。
华东化工学院	交通、大同、震旦大学化工系	东吴、江南大学化工系	无
上海航务学院	无	无	无
华东师范大学	大同、沪江、圣约翰、震旦大学教育系	浙江大学地理系	无
华东体育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	南京、金陵大学体育系	无
上海医学院	无	浙江大学药学系	无
上海第二医学院	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医学院及同德医学院	无	无
上海水产学院	原吴淞水产专科学校 改设	无	无
上海财经学院	大同大学经济、会计、银行、工商管理系、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复旦大学会计、统计、企业管理、贸易系, 企业管理、贸易科; 沪江大学会计、银行、工业管理、国际贸易系; 东吴法学院会计系; 上海学院会计、企业管理科; 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会计科; 立信会计专修学校。上海商业专科夜校	东吴大学经济系; 浙江财政经济学院会计、财政金融、企业管理、贸易系; 江南大学工业管理系;	无
华东政法学院	复旦、震旦大学、上海学院、东吴法学院法律系; 复旦、沪江、圣约翰大学政治系	南京大学政治、法律系; 安徽大学法律系	无
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	原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改名	金陵大学音乐系	无
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	原上海市立戏剧专科学校改名	山东大学艺术系戏剧组, 金陵大学电	无

		影播音科, 苏南文化教育学院电化教育科。	
上海俄文专修学校	原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外文专修学校改设	无	原有东方语文系调至北京大学。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	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五年一贯制机械科三年级学生。	无	无
华东纺织工学院	无	南通学院纺织系、武汉中南纺织专科学校	无
震旦大学托儿科			并入南京师范学院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并入江苏无锡华东艺术专科学校

资料来源:《华东地区院系调整设置方案》,上海档案馆档案, A26—2—152 卷

因此,虽经过连年的调整,上海的高等教育重镇地位其实并未改变。高校的数目大为减少了,但从表二可见,调整后教授、副教授的人数为 946 人,比解放初 1138 人减少 17%;教师总数则从解放初 1889 人增加到 2438 人,仍约占全国专任教师总数 27089 人的 9%。^①这一方面反映了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客观上具有承载较大规模高等教育的能力,不应简单地考虑高等教育地理分布的平衡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在这次院系调整中还是照顾到了上海知识分子的普遍顾虑,没有把他们大规模地迁出上海。于是,上海的高校仍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区域。

表二:上海高等学校师生人数表,1952 年 11 月

学校	总数	教员				学生
		总数	正副教授	讲师	助教	
交通大学	4190	341	103	54	184	3345
复旦大学	2977	284	142	37	105	2277
同济大学	3085	232	68	38	126	2542
上海医学院	1990	177	28	31	118	1466
华东师范大学	1916	254	123	50	81	1356
华东化工学院	969	97	33	16	48	732
华东体育学院	244	23	15	2	6	158
上海水产学院	706	57	17	16	24	571
华东政法学院	1230	54	4	1	49	990

^①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4 年》,第 972 页。

上海航务学院	582	52	24	6	22	456
华东纺织工 学 院	1936	123	39	16	68	1643
华东交通专 科 学校	1654	59	14	22	23	1456
上海第二医 学 院	1697	96	25	24	47	1405
上海俄文专 科 学校	1911	100	60		40	1612
上海财经学 院	3809	373	174	34	165	3147
中央音乐学 院 华东分院	468	65	42	9		334
中央戏剧学 院 华东分院	343	51	35		16	244
总数		2438	946	356	1136	23734

然而，正如华东区院系调整委员会主任舒同所指出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是适应新中国建设需要，是进一步巩固与提高思想改造的成果，是高等学校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①，经过这次调整，上海高校作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所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以往，高等教育虽然也受到政府干预，但大学基本上是知识分子的自主社区，是以教授为中心来开展学术和教学活动的。而这次院系调整，通过院校的大规模撤并和教师的大规模调动，基本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为全面发展一种以“专业”为核心的办学模式开辟了道路。

“专业”是一个当时从苏联引进的概念。按照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的解释：“专业就是一行专门职业或者一种专长。按照苏联高等教育制度‘专业’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高等学校的教学设施，以专业为基础，系不过是学校里面的行政单位。政府培养人才的办法，是按照国家建设的需要，确定专业的设置，并以专业为基础作有计划的招生。每种专业，各有一套的教学计划，按照这种经过慎重考虑的教学计划去学习，学生毕业时，即可成为那一门的专家，立即可以担任起工程师或其他相当的职务。”新旧制度的区别在于，“旧制度下院系的设置，是自上而下，先办起一所大学，内设若干院，每院下设若干系，如有必要，再将一系分成若干组。在新制度中，首先考虑的不是设系问题，而是设置专业的问题。政府按照国家经济、文教、政法等各方面建设的需要，决定全国应该设立的专业，然后结合各高等学校的师资、设备条件，在每校设置一定的专业。专业决定以后，几个性质相近的专业，可以结合成为一系；同时一系也可以只有一个专业。”^②

这就是说，以后首先是国家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来确定设哪些专业和计划怎样的规模，高校便依此组织教学活动，而不象过去那样由学校主要根据自己教授的情况自主地发展某些学科。专业于是成为国家对高校知识分子在学术上进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媒介。通过在院系内

^① 《华东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昨讨论高校院系调整问题》，《解放日报》，1952年8月3日。

^② 曾昭抡：《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问题》，《新华月报》1952年10月号

各种教学研究指导组的设立，教授们的教学研究活动全部纳入了这个专业的集体组织之中，很少再有“个人主义”的自由学术空间。例如，一份同济大学物理教研组的总结报告称：“思想改造及本学期开学前进行了苏联先进教学制度的学习之后，大家克服了自由散漫的作风，批判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认识了苏联先进教学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对人民教育事业表现出高度的热忱。”^①

不仅教师在专业体制下组织了起来，学生也从招生到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完全纳入了专业体制。

1952年夏，第一次实行了全国高校“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统一计划、统一考试、统一分配的原则下进行招生”。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高校都纳入的统一的招生计划。招生章程规定，考生将按系科专业类别录取，录取后的学生不准转院系，并且高校也不再招收转学生。^②这样，学生入校后就只能在择定的专业下学习。

同时，中央决定，1952年夏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全部实行国家统一分配，并将理工科三年级学生提前毕业，也加入分配计划。中央要求根据“集中使用、重点配备”的方针，“把专门技术人材放到经济建设最需要的岗位上去”，为此必须“继续加强对毕业生的政治思想工作”。^③毕业生服从统一分配于是成了又一个政治运动，各校纷纷打出百分之百服从统一分配的牌子。

因此，与院系调整同步，统一招生和统一分配的全面实施使高等教育体系完全成为国家建设事业的一个人力资源部门，同时在组织上巩固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上海于是成为向全国工业化建设事业提供高级技术人力资源的基地。其高校系科和专业的基本格局如表三所示。在1952年上海高校招生6971人中，工科4014人，理科361人，医药883人，师范585人，财经160人，外语689人（俄语660人，英语29人），文科140人，文艺体育139人。从中可见，调整后的上海高校完全着重于工科、医药、师范和俄语（因学习苏联的需要）等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早先作为上海高校特色的文理科理论人才培养已压缩到很小的规模。

表三：上海市各高等学校系科专业设置情况

学校	系数与系别	本科专业数与专业名称	专修科数与名称
复旦大学	(9) 中国语文, 外国语文, 历史、新闻、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经济	(15) 中国语文, 俄罗斯语文, 英国语文, 历史, 新闻, 数学, 物理学, 有机化学, 分析化学, 有机化学, 无机化学, 物理化学, 植物生理, 动物学, 植物学, 政治经济学	
交通大学	(7) 机械制造, 动力机械制造, 运输起重机制	(23) 机械制造工程, 金属切削机床及其工具, 铸造机及铸造工程, 金属压力加工及其车间设备,	(15) 金工, 铸工, 锻工, 焊接, 热处理, 金

^① 《同济大学物理教研组总结报告》，上海档案馆藏档，A26-2-154。

^② 华东区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关于投考高等学校的几个问题》，《解放日报》，1952年8月2日。

^③ 《根据“集中使用、重点配备”的方针，高校毕业生将由政府统筹分配工作》，《大公报》，1952年8月8日。

	造, 电工器材制造, 电力工程, 电讯工程, 造船工程	金相热原理及其车间设备, 汽车制造, 内燃机制造, 锅炉制造, 涡轮机车制造, 热力发电厂设备, 蒸汽机车制造, 起重运输机械制造, 电气绝缘与电缆技术, 电机与电器制造, 发电厂配电网及其系统, 工业企业电气化, 轮配电, 电话电报通讯, 有线电工, 船舶制造, 船舶蒸气发动机及其装置, 船舶, 轮机	工工具, 电机制造, 发电厂电机, 输电与配电, 工业企业电气化, 长途电讯, 市内电话, 电讯工程, 船舶制造, 船舶动力制造
同济大学	(5) 铁路公路, 上下水道, 结构, 建筑, 测量	(10) 铁路建筑, 汽车干路与城市道路, 上下水道, 工业与民用建筑, 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 桥梁隧道, 房屋建筑学, 都市建筑与经营, 工程测量, 航空测量	(8) 铁路, 公路, 材料检验, 桥梁, 建筑设备, 建筑施工, 工程测量, 上下水道
华东化工学院	(3) 无机工业, 有机工业, 化工机械设计	(5) 无机物工学, 碱酸盐工学, 有机合成工学, 燃料化学工学, 化学生产机器及装备	(2) 皮革, 工业分析。下设 5 专业: 玻璃, 硫酸, 食盐电解, 皮革, 工业分析
上海航务学院	(3) 航海, 轮机, 港埠工程	(4) 船舶驾驶, 船舶动力装置, 船舶修理, 水道与港口	(1) 无线电
华东纺织工学院	(3) 纺织工程, 染化, 纺织机械	(4) 纤维材料机械工学, 纤维材料化学工艺学, 人造纤维, 纺织工业机器	(4) 棉纺, 棉织, 印染, 纺织机械
华东师范大学	(10) 中国语文, 外国语文, 历史, 地理, 教育, 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音乐	除外国语文分设俄文、英文二专业外, 其余各系科仅设一专业, 其名称与系科名称同	(9) 俄文, 历史, 地理, 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政治教育, 音乐
华东体育学院	(1) 体育		(1) 体育
上海医学院	(2) 医科, 药科	外科, 妇产科, 眼科, 耳鼻喉科, 药科	(2) 医专科, 药专科
上海第二医学院	(2) 医科, 牙科	内科, 外科, 牙科	(2) 医专科, 牙专科
上海水产学院	未定	(5) 海洋渔业, 航海, 淡水养殖, 水生生物, 水产加工	(4) 渔捞, 养殖, 制造, 水产行政
上海财经学院	(7) 财政金融, 财务会计, 统	(12) 货币与信贷, 财政, 国家保险, 工业财务管理, 工业会计, 统计, 工业管理,	(5) 会计, 统计, 工业管理,